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a on the Mind*

# 精神分析与 中国人的心理世界

【英】Christopher Bollas 著  
李明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China on the Mind*

# 精神分析与 中国人的心理世界

【英】Christopher Bollas 著

李明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分析与中国人的心理世界 / (英) 博拉斯 (Bollas, C.) 著; 李明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184-0087-4

I. ①精… II. ①博… ②李… III. ①精神分析—研究 ②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IV. ①B84-065 ②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5634号

## 版权声明

*China on the Mind*

Copyright © 2013 Christopher Bollas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by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总策划: 石 铁

策划编辑: 阎 兰

责任编辑: 阎 兰

责任终审: 杜文勇

责任监印: 刘志颖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张: 12.00

字 数: 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84-0087-4 定价: 36.00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4-4692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 400-698-1619 010-65125990 传真: 010-65262933

发行电话: 010-65128898 传真: 010-85113293

网 址: <http://www.wqedu.com>

电子信箱: [wanjianedu1998@aliyun.com](mailto:wanjianedu1998@aliyun.com)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 (邮购) 联系调换  
141421Y2X101ZYW

## 中文版序

东西方思想交流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很多人看来，精神分析作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发明，是一种西方的事物。在一定意义上这的确没错。可是倘若仔细检视，就一定会发现许多精神分析的基本实践中体现了某些中国文化中关于意义感的基本假设。精神分析的方法——病人自由联想，分析师以一种“悬浮注意的平等心”来倾听——与中国古人对待人接物过程中不可直来直往的看重惊人的相似。

有人说中国人缺乏有关个体自我的理论，说中国的“孝道”让个体的隐私变得不可理喻，这些说法并不正确。

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倘若要给他们的病人提供周到的服务——包括每周一次的治疗、精神分析、团体治疗等各种形式的服务——就应当检视一下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中具有那些具有治疗作用的要素。只有通过研究这种内心世界的形成的路径——就像其他文化也必然肇端于他们自身的传统思维方式一样——才有可能在一定深度上整合其他观点。我希望这本小书可以说明一种观点，尽管有些讽刺意味，其实中国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中了。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可以看到确实如此，从而不但可扩充中国文化对思想和表达的历史贡献，而且可以扩充中国文化为那些苦苦寻求内心苦闷之解脱的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作

的贡献。

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思考这么一本书究竟如何帮助一个抑郁的人，一个无法正常工作的人，或者一个无法正常建立与别人的关系的人，或者暴食的人？

每一个中国的（心理）医生都不但要尊重心理世界中长期以来“统治”着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那些要素，而且要找到一条将这些要素应用到临床工作中的途径。

譬如有人处于抑郁状态，少言寡语。

在这种状况下（不可避免的）此人会感到不宜表达自己的忧伤，尤其是在一个外人面前更不应该表达。尽管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试着劝说病人敞开心扉，告诉他这会有帮助，而且也不必为此感到奇怪或者丢脸，这种做法即便可能会开始奏效，还是违背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

那么如果心理健康工作者无法让一个中国病人敞开心扉，讲述私密的、特别个人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弗洛伊德有个著名的发现：如果病人只是谈论日常生活，他/她的心（或者脑）就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于是，病人可能会一开始谈论老板多么苛刻，然后说这个世界多么不公，然后又说不知道给孩子买什么生日礼物，然后又说太太提醒他要买鸡回家做饭。这些各种各样的想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乍一看，没什么关系。

老板苛刻，世界不公，孩子的生日礼物，太太要他买鸡回家做饭的提醒。

这可能会有什么意义？

在弗洛伊德看来关键的问题是，这一系列的观念背后有什么隐藏的逻辑？

所以，可以把病人们的自由联想想象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想到苛刻的老板，世界的不公，给孩子的礼物，还有太太的命令？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有可能得到以下答案。病人知道应该给孩子买礼物，并且按照太太的要求买只鸡回家做饭，可是他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想这么做，他是被强加的，就像被老板管着（周围全是老板的世界是不公平的），他不想就范。反抗途径之一就是得抑郁症，什么都不干。所以，还挺有效。

每种文化都会尊重人们在这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说——哦，你得像挪威人那样思考问题，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更高级！

无论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对西方的精神分析多么感兴趣，他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应该去了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了解中国人的“成语”。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种潜在的可怕的结论这样声称——“中国人没有个体自我的概念，唯一的自我是作为家庭的一员而存在的”——因为概念本身就有可能不可翻译的，所以它的结论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差。在这个世界上，在没有哪个诗人比杜甫更个人化，更独特。他的诗歌以及他同时代的很多诗人的作品有力地反驳了中国缺乏个人的声音这种说法。

所以，再回到我们的问题。

这本书如何能帮助一个人与病人工作？

翻开封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宗教家和哲学家以及诗人的引文。要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世界，每个医生都需要对这些要素的历史具有深入的了解，因为这些要素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正本清源，回到过去这些要素形成的源头，因循它们演化的历史，直到今天，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者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可以消化西方观念的境界。

如果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希望自己的临床工作能对中国病人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对中国人的心理世界及其独特成语的欣赏是他不可回避的基本素养。

克里斯托弗·博拉斯

洛杉矶，2014

# 目 录

中文版序 .....	
绪 言 .....	001
第一部分 滥觞 .....	021
第一章 时刻 .....	023
第二章 诗我 .....	033
第三章 成人 .....	053
第二部分 实证 .....	061
第四章 生命之门 .....	063
第五章 精神整合 .....	077
第六章 内求之路 .....	083
第七章 无为之乐 .....	095
第三部分 大观 .....	111
第八章 修心 .....	113
第九章 文明之裂 .....	123
第十章 迷于思 .....	133

第十一章 众人之心 .....	141
第十二章 可能性 .....	149
第十三章 尾声 .....	165
致 谢 .....	171
译后记 .....	175

## 绪 言

2010年我在韩国做了一系列的演讲，之前曾在2009年到日本游历过，本书正是发轫于这些演讲。

起初，我想在演讲中呈现一下我对几位重要的哲学家的了解，他们的著作对东方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老子、孔子，尤其是庄子，看看他们的观点和西方思想之间是否存在重要的关联。

可是，在为这些演讲做准备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东方思想和精神分析思想之间的一些关联，于是我开始探索精神分析实践的某些特点与东方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关联。

另外，汉字极具感情色彩和思想韵味，所以我对汉字也十分着迷。通过品读李白、王维、杜甫和韩国诗人及日本诗人的作品，我得以领略这个地区独有的诗歌风格。通过这些，不但可以从中学习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而且找到一条途径，让心灵在诗歌中得到寄托。人们可以通过朗诵诗歌进入一种开放的梦境。

于是，我的目标又产生了一些转变，开始试图探讨一种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东方的心理学——这对西方人研究人心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所谓精神分析的心学探索具有深远意义。

这项工作让人感到惊喜不断。作为东方学的门外汉，我发现一

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向我展开，同时我也欣赏到很多之前未曾理解到的精神分析之美。所以，本书不仅仅是对东方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研究，而且是本书作者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在生活中的一次学术上的“奇遇”。

尽管中国向西方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商人和游客开放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之久，但对很多人来说她依然十分遥远。有一种解释说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卓然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让人感到不可企及。可是我认为中国，以及韩国、日本和其他远东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还应该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妄自尊大、民族保守或者岛国的狭隘，而是因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本书探索的是东方的心学（Eastern mind），但这项工作面临一种风险，能否简单地分为东方的思维方式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本人认为断然不可。当一个人去使用“东部心”、“东方心”、“中国心”——或者“西方的心”、“西方心”或者“欧洲心”这些说法的时候，是否真的恰当？这些分类不但主观而且过于简化，而且正如我将在本书中说明的，它们从某些具体的角度来看并不准确。而我将做的这种管窥，也不能不从这个说法出发，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在本书中要探讨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是，当我们探讨东方和西方的某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时，我们不是在说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整个的心之间的差别，而是在说人心的某些部分东西方之间的差别。从历史上看，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反映了“母性的规则”，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表达了“父性的规则”。

根据母性的规则，知识的传递过程中会将知识接受者的自我视为胎儿、婴儿或者幼儿，是人们在学会语言之前的一种知识传授过程。这是一种自显（presentational）式的语言。世界就像一个物，自我呈现——或者被呈现——并给自我留下印象。比如说，母亲会不断通过自己的行为逻辑传授给孩子如何生存，如何处理和外界的关系的各种公理。这些行为被婴儿的自我同化，成为正式的范式，左右着它们幼小的自我。这种知识在成年人之后得到延续，与父性的规则并行不悖。

婴儿体验到的各种交流的方式——包括所听、所见、所触——会将情绪转化为体验，这构成了人类相互关联的核心。

父性规则指的是那些依赖语言的交流方式。它们传递着父亲的理念，并且成为后来社会生活中的假设和律法。

当然，现实中父亲和母亲通常兼顾两种规则。

简而言之，东方的心重视“前语言”或“非语言”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母性规则），而西方的心通常更倚重语言表达，借以传达自己，根据父性的规则发挥功能。东方的心是用语言创造可能的意义诠释，是隐而不显的解释。而西方的心寻求清晰的界定，显而不隐，但不是人尽可知。

东方的心可以在五部核心经典中看到，其中三部经典《诗经》、《礼记》和《易经》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骨架，体现了中国的心。这五部“母经”——我这么称呼她们——成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以及后世儒家作品的思想基础，传到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就是代代相继的各种理解。单行的著作因而而是其分支文化

的衍生品，包括道教、儒教、新儒家等。根据他们和那些“母经”的关系，长期的解经过程可以理解为“过渡客体”（温尼科特语，Transitional objects, Winnicott），或者更准确地说，叫做“过渡时刻”（transitional moment），后者表达了中国人的礼仪和诗歌体系的尊重，这是引导中国人生活的“道”。

东方的“母经”及过渡的诠释者们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模板，而西方的心理学尽管也探索维系传统的生活方式，毕竟期望着离群自我，期望自我可以从群体中独立，这是对传统的挑战。东方的话语是模糊的，允许通过交流共同建构，而西方的话语强调透明，强调言说者和倾听者之间清晰的界限。信息意味着差异，信息的传递是把人和人分开，标出他们之间的界限。

后法家<sup>1</sup> 哲学家荀子<sup>2</sup>（前 293—235）认为人性是混沌的，需要借助高度的礼制才能建立社会结构，指导人们的生活。看到这一点，谢和耐（Jacques Gernet）得出一个结论“当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在 17 世纪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对话有多么困难”<sup>3</sup>。

郝大为（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Ames）在他们的杰作《臆想中国》（*Anticipating China*）中指出西方思维重因果，东方思维重关系。西方逻辑是转喻式的或者历时性的，东方的思维是比喻式的或者共时性的。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偶尔出现过对逻辑和理性思维的兴趣，“但很快就会湮没在形象具体的感通类比思维中。”<sup>4</sup> 中国人所见的世界不是充满了实质上的差别，而是充满过程上的不同。

大约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印欧大陆的雅利安人进入北印度，

与当地入杂居。在这种共居的生活境遇中诞生了印度教。C. 史葛·利特尔顿 (C. Scott Littleton)<sup>5</sup> 认为他们带来的观念与当时的古希腊并无不同。在同一个地区, 在北印度这个地方, 大约公元前 6 世纪末到公元前 5 世纪初, 佛陀诞生了。所以,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两大运动: 印度教和佛教。

大约在公元前 2500 年, 在苏美尔的乌尔 (Ur in Sumeria, 今天的伊拉克), 大约北印度往西 3000 公里, 我们发现了第一部公认的西方史诗: 《吉尔伽美什史诗》。她传递了一种个人应征服自己的世界, 留下自己的印迹, 并让它流传千年的思想。恩克都 (Enkidu) 原本是一个野人, 与野兽一起生活, 后来因为女人的诱惑, 被迫进入了文明社会。吉尔伽美什战胜了恩克都, 因而他征服了自然。《吉尔伽美什史诗》早于荷马史诗近 2000 年, 直到公元前 8 世纪后者才出现, 但从苏美尔到荷马时代, 有一条清晰的脉络, 人类征服世界的野心清晰可见。自然界终究要被人类征服, 人要通过自己的英勇留下自己的足迹。重点在于保持自我的独立, 实现自我的报复, 哪怕最鲜活的生命灰飞烟灭, 哪怕死后不能得到永生亦不足惜。

换句话说, 在这个地区, 在多民族长期聚居交融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思维的传统向西方传播, 而另一种思维的传统则传到东方。

在公元前 2000 年, 游历东方, 我们步入了精神的王国——印度, 并且与中国的哲学相遇, 后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认为这是人的天命 (obligation)。人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他们认为人生只是个过程。

但是，这并不是说东方人的心里没有个体自我的观念；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印度教相信婆罗门（*Brahman*，又译为：大梵天），或者叫做宇宙的灵魂，但同时也看到这种普遍的原则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会有独特的体现：内在的自我或者阿特曼（*atman*，又译为：神我）。它看到法（*dharma*）——伦理、社会和万物神圣的秩序，和业（*kharma*）——一个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从这个角度看，我会说印度教预见到了个体的自我与大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并指出了这种关系的结构。在中国，有另一套通俗的说法，用来弥合同样的冲突。

西方的史诗基于人在外部世界中的历险，检验英雄的力量、耐心、勇气和机智，而东方的文本则看重生命历程中转瞬即逝的刹那。在印度传统中，则要发现个人的阿特曼与宇宙的灵魂之间的关联，这种发现——解脱（*moksha*）——被视为一种超越。

东方重超越主义；西方重英雄主义。

东方和西方都将人的生命视为一个旅程，但是它们对旅程的理解并不相同。西方人的心总在探索外部的世界，在这个永不停歇的旅程中不断地找寻新的证据，证明历险者的伟大，并将发现的东西归功于发现者。强调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强调组织和分析，以期能够扩充知识的宝库。东方人则探索精神的世界，寻找内在新的立足点，以期能够通达充满启发的内在高妙境界。东方人的目标是降低自我的破坏性，通过宗教和仪式找到一条成就更完善的人格途径。

在西方，根据他们通过语言做自我表现（*self-representational*）

的传统，语言成了知识分子的商品。这是一种平等的（交易），被发现的成果可以共享，也可以接受别人的质疑。东方人的传统是自我显现（self-presentation），是把生活本身作为蓝本。言说越少越好，因为借用语言来表达意味着言说者的行为方式尚未达到让人一目了然的境界。在西方，言说意味着融入；在东方，言说意味着远离。

我将在本书中对“显现”和“表现”进行区分，对自我显现和自我表现做区分。显现（无论在何种语境中）都是一种存在或交流的形式；表现是指交流的内容。东方人更加强调呈现，往往规避表现，而西方人心中内容才是交流的核心。

当然，尽管东西方在生活哲学上存在这种重要的分歧，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有学者指出，东方的史诗也有紧密围绕英雄自我的成就展开的——有人把12世纪日本长诗《平家物语》（Heike Monogatari）和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相比较。相反，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史诗也会运用一些成语，表达个人生活中的精神境界，比如中世纪的一些寓言故事就是如此。

关键在于东方和西方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和西方的心灵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实际上，我认为它们的源头是一个，所以这种“心”最终还是有可能重新汇聚在一起。但是，认识到这两个极端目前所看重的人类存在维度上的巨大差异，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裨益的，这种侧重的差异促成了两种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别。

两种世界观都酝酿了强有力的宗教，培养了很多经学的传人，

他们以一种刻板的方式解读经典。换句话说，他们在延续着一种权力中的等级关系，如果我们把印度吠檀多哲学中的神秘派（arcane）对奥义书的诠释，和西方中世纪对圣经的解释做一个比较，这一点就会很明显。

然而，尽管两种传统都具有自己的圣典，口耳相传，而且往往配上音乐。可是在东方不但经典的内容被视为是神圣的，诵读的时候那种声音本身也被视为一种神圣的体验。这一点进一步说明东方重视形式。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希腊社会生活的重心是政治（polis），在那里，长期以来宗教戒条开始世俗化，成为辩论的对象，律法在民主争议的温床上被不断审视。在同一个时代，中国正在走向中央集权；宗教的融合，臣服和强权下的伦理把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一起。中国人很少质疑他们的法律，往往压制任何有损于权威的个人的观念。尽管中国出现了自己的理性思维，这种思维很明显在协调新的商贸、军事和技术现实方面很成功，但是集权时代的思维方式从来就没有被放弃。历史与现实手拉着手一起走来。

谢和耐（Jacques Gernet）将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和中国做了对比，指出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有机哲学”<sup>6</sup>。它是理性的，但是它关心的是宇宙，它所热衷的问题西方哲学家当时毫无兴趣。谢和耐把孟子<sup>7</sup>和希腊人做了比较，认为孟子关注的是“生与制”<sup>8</sup>之间的平衡，而希腊人对“感性的世界和认识的世界”之间的“极端对立”，这种二分中国人“会认为……只不过是人为的侧重而已”<sup>9</sup>。